

# 诺贝尔文学奖：20 世纪文学全球化的样本

[作者] 陈春生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本文认为，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它的全球性特征，但这个特征是通过西方人逐渐克服认识上的局限来实现的。其它地域、民族文学的融入淡化了这一奖项的西方色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表明：在一个信息多元的社会里，任何一种文学以及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可能左右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的全球化不是强势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征服或置换，而是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对话、融合。

[关键词] 诺贝尔文学奖，全球化，文学融合，样本

实际上，对文学全球化的展望在 19 世纪欧洲政治家和作家那里有过不同的言说，不管这种言说的预见性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但它毕竟展示了西方人对可能出现的文学发展态势的一种预见，到了瑞典实业家诺贝尔那里，他试图把别人的构想通过现代商业社会的货币形式变成现实，在 1895 年 11 月 27 日立下的最后一份具有法律效率的遗嘱中，他写道：

所有我留下的不动产，应以下列方式处理：其资金将由我的委托人投资在安全证券上，建立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在最近数年来造福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人。”

诺贝尔将这笔奖金分为 5 等份，分别赠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具体到文学，诺贝尔要求获奖作家必须是“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诺贝尔还特别强调了这个奖项的全球性特点，他指出：

“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地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授予奖金。”

诺贝尔希望以“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为标准，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纳入到一个体系中，检视一个世纪的颁奖史，应该说它基本上遵循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20 世纪 100 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囊括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流派、不同地域和民族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一个超越民族、地域、意识形态的文学体系。这个由西方人设立并由西方人遴选作家的奖项，因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学融入，它的西方色彩被淡化了，一种多民族文学相互对话的机制已经形成。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表明：在一个信息多元的社会里，文学的全球化不是以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征服或置换，而是各民族文学在对峙、渗透、融合中形成对话。诺贝尔文学奖记录了西方文学从排斥、接纳到与他民族文学相互融合、对话的过程，它是研究 20 世纪文学全球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标本。

—

诺贝尔文学奖能成为文学全球化的标本，是因为这个奖项能清晰显示 20 世纪不同民族文学相互融合的过程。瑞典文学院顺应世界文学的潮流，不断丰富“理想主义”的内涵。“理想主义”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理想的理解大不相同，既然这个奖项的设立者和执行者都浸淫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那么它必然打上西方人的烙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主义”逐步显示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最初把“理想主义”理解为：“就是文学上的正统性，符合宗教精神和社会道德秩序，能激发人乐观向上的情绪。”“为人类，为符合人道、常识、进步及

幸福所做的奋斗，”在这种“理想主义”标准支配之下，最初 10 年的获奖作家，与当时丰富的文学现实相比，显得略微单调：从地域上说，获奖作家全部集中在北欧和西欧；从内容来说，获奖的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主要描写生活的光明面，即便抨击生活的假丑恶，也基本上在正统的道德范畴之内；就创作倾向来说，获奖作家基本上局限在写实主义范围内。对获奖作家的理解和评价也较为保守：苏利·普吕多姆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比昂逊“以诗人般活跃的灵感和难得的赤诚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贵、华丽而又色彩缤纷。”卡尔杜齐的获奖“不仅因为他渊博的学识以及独有见地的深刻研究，更由于他伟大的诗作所特有的创造力、清新的风格以及抒情特征。”这几则评语表明瑞典文学院试图以 19 世纪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精神价值，捍卫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尊严，以传统的宗教精神作为拯救人类的基本方式。显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内涵，诺贝尔文学奖只能吸纳那些讴歌人类纯真情感的作品，无法表现 20 世纪人类在文学领域对理想追求的多样性。

在积累了 10 年颁奖经验后，瑞典文学院审时度势，赋予“理想主义”新内涵，使颁奖直接感受着世界文坛的脉动。从 1911 年开始，他们开始关注现实主义思潮以外的文学创作，这一年的获奖者是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瑞典文学院对梅特林克“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形式”和“对人的内心的意念”的挖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它表明当时非常风行的现代主义文学新质素进入到了评委的视野。1912 年，德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霍普特曼的获奖，使得“理想主义”不仅包括表现人类正向价值的作品，也吸纳那些描写人类精神中负向价值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在世纪初曾被排斥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之外，甚至诺贝尔本人也认为左拉是“一位肮脏的作家”，但霍普特曼却以自然主义作家的姿态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宣读霍普特曼颁奖词的是一位新的执行秘书，他开篇引用一句格言：“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并且指出：“一棵叶茂枝繁的大树，当初不过是一粒不起眼的种子而已。”显然，瑞典文学院力图通过丰富“理想主义”的内涵，使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变成“一棵叶茂枝繁的大树”，颁奖词特意将作家展示的阴暗面与诺贝尔遗嘱精神进行了深刻而精当的联系。他们认为，霍普特曼戏剧的“最大特点就是使人们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最值得赞叹的是，当他描写人世间的阴暗面的时候，也未忽略人性的尊严”。当然，他们对揭示人类生活阴暗面的作品的肯定是审慎和有限度的，他们特别强调：“诚然，生活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但这种阴暗面必须以高超的文学手法才能处理好，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正是对“理想主义”内涵的调整，使得那些展示人性弱点的作品被诺贝尔文学奖接受，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一批现代主义作家，也进入到以正统文学观念相标榜的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这些反传统作家的进入，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表现手法都拓展了人们对“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理解。当然，瑞典文学院对现代主义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遴选者并不是从文学的现代性立场上肯定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锋性价值。这从 1923 年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获奖就可以看出端倪，叶芝获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灵感的诗歌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瑞典文学院把他看成是爱尔兰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而授予他此项殊荣。但面对叶芝的象征主义诗歌文本时，评委们以阅读传统文学的经验来解读他的诗作，因而他们对叶芝的理解显得非常独特：“他的艺术通常是非常晦涩的，所以要想理解就得十分细心。这种晦涩的成分，来自内容的神秘色彩和盖尔特人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体现在诗的光彩、细腻的情感和深入入微的洞察力中。自然也受当时潮流的影响，那就是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手法，驱使他总是呕心沥血去寻找、推敲合适的字眼。”评委们一方面感受到了叶芝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创新，另一方面却从传统的审美视角来欣赏他的智性诗歌，他们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两端中寻找一个结合点，显露出一种矛盾心态。

1927 年，柏格森的获奖又使“理想主义”向容纳现代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瑞典文学

院对柏格森“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表达的卓越技巧”非常欣赏，恰恰是这种富有生气的思想，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之一，给现代主义诸流派以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批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30年代皮兰德娄和尤金·奥尼尔能够获奖，与他们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是分不开的。40年代艾略特、威廉·福克纳、50年代的贝克特、加缪，60年代的萨特等现代主义作家，也因为他们的反传统精神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青睐，这些作家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不同流派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构成了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独特方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最精彩的华章。

“理想主义”内涵的不断拓展，使瑞典文学院遴选作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它顺应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不断变化了的审美观念，作为一个文学体系，诺贝尔文学奖吸纳的作家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更加成熟。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两面旗帜下，100年来，世界文学中三股重要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都被它融合在一个体系中，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法朗士、高尔基、马丁·杜伽尔、斯坦贝克、马哈富兹、戈迪默等，也有审美趣味与传统文学绝然相左的作家。如梅特林克、艾略特、威廉·福克纳、贝克特、加缪、萨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在这个体系中还有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如肖洛霍夫、安德里奇等。这些创作观念、艺术风格迥异的作家之所以能聚会在一起，是因为“理想主义”精深内涵和随时代变迁所显示的开放性和生命活力，正如阿斯图里亚斯所说，“这是一个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对人性的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鞭挞，成了这些作家共同的价值取向。

## 二

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反映文学全球化特点还在于获奖作家在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如果说对“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的内涵的拓展，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体系吸纳了不同流派的作家，那么，从地域上看，诺贝尔文学奖从关注欧洲到关注全世界，不断地使诺贝尔遗嘱中全球性精神要义变为现实。在“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旗帜之下，记录了文学全球化的历程。如果我们把斯德哥尔摩比作灯塔的话，这个“擎着光明火炬”的灯塔之光，尽管疏密不匀，但世界5大洲已沐浴到它的光辉。

在开始颁奖之初，由于西方人的优越感，瑞典文学院对欧洲以外地域和民族的文学采取一种漠视态度，1945年以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体系的几乎都是欧洲大陆的作家，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等国之中，其他地域和民族的作家很难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即便是进入，也是以西方人的视野加以吸纳的。这表明全球化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以1913年泰戈尔的获奖为例，可以看出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人最初对东方文学精神的误读，泰戈尔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东方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方文学独特的价值和审美趣味，但是，瑞典文学院有意识地淡化泰戈尔作为东方人的地位和身份。在获奖理由中，瑞典文学院“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很显然，在1913年，西方人没有考虑到泰戈尔作为亚洲人的巨大意义，他们更愿意将泰戈尔看成自己文学体系中的一员，英国批评家说，泰戈尔的出色成就“体现了英国文学的出色高峰”，在那个时代，西方人欣赏泰戈尔能用娴熟的英语表达思想观念，而不是思想观念本身。但泰戈尔的获奖客观上显示了东方深厚文明根基中孕育出的文学的独特魅力，瑞典诗人海顿斯坦称泰戈尔是“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一个理想诗人。”叶芝也认为“泰戈尔诗歌是高度文明的

产物”。而泰戈尔则以东方人的文化身份来接受这个奖项的，他说：“你们全面、深刻的理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相信文学能消除误解、化解分歧，使人类和睦相处。泰戈尔进入诺贝尔文学奖体系的意义表明，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强势文学不可能置换弱势民族的文学，东西方交融不仅可能性，而且是必然的。

如果说，1913年给印度作家泰戈尔授奖，显示了“西方中心论”的固执，那么1945年，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的获奖，则表明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遗嘱中世界性眼光的重新发现。这种世界性眼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1961年，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获奖，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注意西方意识形态以外的文学家，1966年瑞典文学院授奖给以色列作家阿格依，则表明对纯正的古希伯来文化的重视。1967年，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夺冠，颁奖词特别强调，“阿斯图里亚斯大量大胆而又杰出的作品却足以使他脱颖而出，使万里之外的我们也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作为一位将叙事技巧与画家眼睛和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家”，“在探索爱、美、死亡以及对价值追求等主题的过程中，极其完美地表现出日本的特征”而获奖，瑞典文学院看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东方特征以及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联系到1913年对泰戈尔的评价，可以看出瑞典文学院对世界多元文化和民族文学特征的尊重，由此显示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

进入70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遴选者的全球化意识更为明显，关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几乎形成了一种自觉。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第一次照射到遥远的大洋洲，帕·怀特“以史诗般的气魄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大陆引入世界文学之林”而夺魁。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首次代表黑非洲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家族，1988年马哈福茨作为阿拉伯文学的杰出代表而入围，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光顾非洲大陆，南非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因其“壮丽而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而成为第3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在20世纪后期，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每隔两年就吸纳一位非洲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家族，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关注一度被忽略的非洲文学，同时也说明，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努力，非洲文学摆脱了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以一个新大陆成熟的文学姿态，融入到世界文学中来，显示出非洲文学的世界性意义。瑞典文学院既关注这些作家在非洲独特文化背景下所显露的思想内涵，又肯定他们艺术上的独创性，对索因卡的评价是：“由于他的文学天才——他的艺术技巧，语言魅力和独创性——的非凡成就。”而马哈福茨是作为当代阿拉伯文学艺术的代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家族的：“他通过大量刻划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艺术。”戈迪默史诗般的作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非洲作家以文学为武器，为非洲大陆各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而奔走呼吁。向全世界展示非洲这块土地上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非洲人面临的问题、非洲人的思考和非洲人对未来的希望。2000年，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学也在更高意义上参与到世界文学中来。这样古代四大文明的发祥地的文学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庄严的仪式，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中。成为文学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这些卓有成效的作家的艺术成就，又增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

### 三

可以这样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获得世界性声誉，并不是因为它在西方强势经济支持下的西方话语霸权，而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性特征促使我们来检视文学全球化所呈现的客观形态，从中引申出许多有意义的思考。

诺贝尔文学奖是依据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模式进行操作,诺贝尔本人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成功者。正是因为诺贝尔有全球经济活动的经历,才使得他具有超越时代的眼光,站在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前沿来设计这个奖项,这表明现代社会中文学发展和其他领域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文学的全球化 and 经济的全球化是依照各自的规则向前发展的,诺贝尔在遗嘱中对文学全球性的构想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执行者很难一下达到他的认识层次,他们只能依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个奖项的遴选标准,于是我们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全球性意识的实现是与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同步:在 20 世纪初,在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下,他们把“理想主义”理解为歌颂人性的真善美,忽略了文学鞭挞假丑恶的批判功能。把遗嘱的补充性话语,理解为超越北欧地域,而不是全球性文学,1913 年西方人因泰戈尔是英属殖民地公民而把他的创作看成是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民族文学并不因为西方的误读,而改变自己的性质。泰戈尔的获奖显示了颁奖者的主观愿望和文学客观效果的分离,泰戈尔创作的东方特色,确定了他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的东方文学对话者身份。同样的,当米斯特拉尔以南美大陆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时,人们关注米斯特拉尔时,并不依据西方学者的评价去理解米斯特拉尔的创作,而马哈福茨以埃及文学甚至阿拉伯文学的代表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会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仪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根植于西方的文学奖,西方优越论虽不可能一下子消散,但进入“理想主义”体系之中的西方以外的文学,他们的本土性特色,给“西方中心”以冲击。同时,其他民族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通过与世界文学对话,也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视野。这种互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各民族文学进行对话的一个基本平台,西欧文学获得了其他民族文学的滋养,而其他民族文学则在对话中获得了自信。

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即文学的全球化与本土文学的关系,我非常赞同《竞争极限》一书中的观点:“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全球化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是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现实证明,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个分枝。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打破原来闭关自守的狭隘界限走向世界,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学不可能因为获得了世界性而淡化了本土性,相反地正式因为具有民族性才使得文学全球化是多种民族文学的融合和对话,在对话中,文学的世界性交流又反过来为丰富文学的民族性提供新的质素。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恰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几乎所有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都以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身份站在世界文学的领奖台上,为自己民族能够在最高层次上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来而欢呼雀跃。罗曼·罗兰在获奖后说“这项殊荣并非属于我个人,而是颁给我的祖国的,我正因此而接受她。同时,每当我想起它有助于传播那些使法国为世人所接受的思想时,我就感到无限欣慰。”而肖洛霍夫则为这个奖项“能颁给苏联作家而自豪”,赛珍珠则以美国人民的代表领奖,在这里西方强势文学几乎不可能占据优势,更多的是参与到世界文学中的民族自豪感。

在这个体系中,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对话机制已经形成。这种对话既有东西之间文学对话,又有南北之间的文学对话,以非洲为例,3 位获奖作家,虽然可能因为民族传统的差异性,在艺术表现方式、书写语言上各有特点,但他们超越了民族界限,就非洲的现实问题,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对话,3 位作家都把非洲大陆实现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任务,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加以关注。在 20 世纪民族解放的浪潮中,他们把自由和独立作为最高境界来追求。索因卡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演说时,特意向南非政治家纳尔逊·曼德拉致敬,而后者当时还关押在监狱里。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把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看成是自己生活中的大事。出于一种政治责任感,她为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纳丁·戈迪默：“演绎了我们人民对和平、自由的深深憧憬。”马哈福茨也是将埃及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自由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他总结说：“感情、政治激情是我艺术实践的主要源泉，”对政治的主动介入，成了马哈福茨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3位作家共同的精神追求使得非洲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政治色彩。政治责任感使得非洲获奖作家关注非洲本土的现实，而且表现了基本相同的主题：为人的自由而写作。

在全球性语境中，不仅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之间彼此对话，而且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以外的作家也在相互吸纳借鉴。这成了我们考察文学全球化的非常重要的个案，当代作家莫言把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做“两座灼热的高炉。”正是在这两位作家的启发之下，他才创作出具有中国北方色彩的“红高粱”小说系列。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从卡夫卡的创作中获得灵感。艾略特对乔伊斯的借鉴，这种不同民族文学对话和吸收，不仅使文学关注的主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而且使得某种新的文学表现手法被广泛的借鉴，改造，我们在曹禺的戏剧中，看到了奥尼尔的表现手法，但是这种手法已经变成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了。

因此，当批评家为文学全球化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中获得了有关全球化的最直观的具体形态：各民族文学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魅力，异质文化的输入，也许可能改变本民族某些与时代不合拍的因素，但是它同时可能激活本民族文学中创造性因子，从而使民族的文学产生新的活力。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42](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42)